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八九期 ——
(二〇一三年四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4a)

【亡灵祭坛】	从乌蒙山到泰晤士河	周孜仁
【微观历史】	文革造反派的市民背景和知识背景	杜钧福
【风雨见证】	陈白尘的“文革”日记	散 木
【记录在案】	报告有关四五运动的一些情况	刘传新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亡灵祭坛】

从乌蒙山到泰晤士河

• 周孜仁 •

中译名“西敏寺”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巍峨最恢弘的教堂之一，坐落于泰晤士河北岸，紧邻著名的伦敦大本钟。西敏寺于公元960年（即赵匡胤登上中国大宋皇位那一年）扩建和改建，历经105年乃成。1540年英国国教与罗马教廷决裂，此前500年间，西敏寺一直是天主教隐修院的教堂，之后又一直是国家圣公会教堂。英伦历代国王加冕登基、婚庆大典都在此举行，王室陵寝亦多厝于此。西敏寺还为众多英国乃至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辟留了永恒安息之所——从牛顿到达尔文，从乔叟、斯宾塞、亨得尔到狄更斯、哈代，从克伦威尔到丘吉尔……西敏寺堪称人类最伟大的史书石卷。

你肯定不会想到，在伟人如此踞踞雄踞的殿堂，已然矗立着一尊云南偏远山区普普通通中国人的塑像。

在教堂西大门，这位中国人和其他9位（包括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享誉世界的名人一起，安详地立于门楣之上，接受全球朝觐者的景仰。人们称他们为“二十世纪人类十大圣徒”和“殉道者”。

他叫王志明。云南武定县下长冲村人。苗族。1896年出生。1906，即王志明10岁那年，澳大利亚传教士郭秀峰万里来此，于远寂的莽莽群山中建了如农舍般简陋的教堂。现在已无法知晓王志明具体何时皈依了主？我们知道的仅仅是：38岁，他成了当地土著苗族自己的牧师，还被选为撒普山苗族总堂会长，主持滇北六族总堂联会。

事情的变化是从1950年开始的。新的国家宪法虽载明公民享有信仰自由，但远山教民的联会事实上是被解散了，以往的基督教活动都实际上被终止，教会被迫转入地下。

1969年，全体中国人疯疯癫癫欢庆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那一年，某日，王志明正为一基督徒施洗，陡然被捕了。

1973年执行枪决。行刑时他的舌头被刺刀绞碎。

这就是圣徒和殉道者的故事。

读到这儿，你难道不会想起耶稣受难？难道不会想起罗马总督彼拉多的士兵给耶稣强扣荆棘冠，残酷鞭打并最终将遍体鳞伤的先知血淋淋钉上十字架？耶稣是神之子，而王志明是实实在在的肉身凡胎。殉难时，他的舌头被同样肉身凡胎的士兵用刺刀绞碎，然后枪毙。他没能复活。

王志明的家乡云南省武定县，是云南乌蒙山区一个极小的、极不起眼的小县。而下长冲村之小，在幅员辽阔、无边无际的中国版图上，更是渺如浮土微尘。同样，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一个微不足道的山区草民，他受难（也如耶稣一般悲苦壮美），他死亡（也被愚昧如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武定百姓兴奋地围观），也就如漫山遍野的草芥被乱风掠过，自生自灭罢了，谁还会记得呢？

但是人类竟然没有忘记他。并且奇迹一样永远地记住了他：以如此庄严、如此永恒的方式，在如此永恒的地方，把他记下了。在远比云南、远比中国边际大得多的视野，让全世界的人把他记住了。

大千世界，所有生命出现时，都同样渺小而卑微，然后走进漫长的、让人敬畏的历史，各自去扮演命运分配的角色，或精彩或黯然，或风光或平淡，或磊落或委琐……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坚守了自己有助于他人向善的信念，并且执著地前行，这样的生命就是值得尊敬的。王志明就是这样的人，以至于能够像耶稣一样坦然面对强权者的暴力、酷刑和死亡。他注定应该和耶稣一样受到永恒的景仰。初闻已走进西敏寺殿堂的王志明，于我，当比别人更多一层惊异。

因为王志明的蒙难和被杀，其时我是应该关注并惊骇的，但竟然麻木。

我当时正在云南最高权力机关——省委办公厅当秘书，且恰恰负责调查这方面的事务。1972年，即所谓“林彪外逃摔死北漠温都尔汗”次年，温和派主政，号召落实政策。云南一大主题就是批判林彪在“边疆民族”问题上的极左（后来又改为“实质极右”）路线。那一年，我去边山野地，和回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彝族……众多的野老村妇座谈调查，让当地政府“落实政策”：比如将改做仓库、会议室甚至猪圈的清真寺归还回民，允许多个民族恢复传统节日，恢复民族服饰的加工生产等等。

基督教偏偏不在此列。文革肇始前的1965年，北京召开第十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伟大领袖就已发了狠话：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帝国主义派来的两支反革命别动队。1972年我参加云南省落实边疆民族政策办公室工作，这句“最高指示”曾多次传达——那时依旧认为存在所谓“宗教复辟”。具体文件没有看到，但我的工作笔记本上曾多次出现。我们办公室一位公安厅原政保处长，也反复说到此事。因此我印象十分深刻。（不知哪位读者能提供那一“最高指示”的出处？）

杀戒早开。文革不过火上添油、推而极之罢了，因此在这方面无政策需要落实，恰恰相反，必须继续斩尽杀绝——这就有了落实民族政策的次年，圣徒王志明被刺刀绞舌、枪毙一节。

我1972年的全部工作笔记幸存至今，得以让我重新忆起当年旧事。时间是1972年10月6日。武定县委书记陈银贵给我们做了汇报。下面是当时的笔记实录：

宗教问题。这几年泛滥，有两个原因：1、原来对教牧人员实行统战，情况还好，文革批判打击这些人，敌人又把他们拉过去了；2、“清理阶级队伍”打击了信教群众，搞逼供信，群众反感，公开宣布信教。“说我们信上帝不好，可我们总不打人。”一些教民被抓，大家还凑钱送给家属。小石桥生产队队长信教，问他：“信宗教还是信共产党？只能信一样！”他说：“信宗教。”抓起来。群众说：“要抓，把我们一起抓走！”……

逮捕了一批长老，又封了一批新长老……

四所民办中学，一所的教师是传道士，三所是虔诚教徒，上课就上基督教，唱赞美诗……

今年虫灾严重，他们造谣说末日要到了，今年收庄稼，明年就收人了……

9个苗族队3个队是教牧人员和虔诚的教徒掌权……

在这些荒芜的文字草丛间，我寻到了王志明：

宗教活动嚣张。此地是撒普山总堂的一个分堂。每个队都有教会，有长老。晋城公社古柏大队大庆生产队17户、99人全部信教。长老张有喜，是王志明（牧师）被捕前封的……

1953年，王志明曾作为宗教上层，到北京见过毛主席……

接下来，圣徒的名字又出现了一次：

今年5—8月我们宣传队进驻，抄出许多1953年上海印刷的圣经……长老用圣经教义来解释文化大革命。主题是世界末日。说硫磺火湖在燃烧，不信教的都要被投入……宣传队没收了这些宗教宣传品。宣传队走，群众就起哄……

王志明被捕后，三个儿子四处活动……

我一点儿也想不起这位给我们汇报这些情况的县委书记是什么模样了，我也一点儿也想不起当初听到这个荒唐而残酷的故事时自己的感觉了。肯定是麻木了。从笔记里已能触摸到这个。如果恰遇了行刑当日我在现场，我想，难说我还不会被请上主席台，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为能一睹圣徒的被鞭笞、被杀而沾沾自喜……

多可怕！

几十年后，我们都已知道，被那个血腥岁月送上死刑台的，远不止王志明一个。北京大学的圣女林昭，还有不计其数的为信念献身的张志新们、遇罗克们，他们被处决时，不也被刺刀割喉、用橡皮塞堵了喉管吗？而且有人，至今还拼命要人们把这些殉道者及与之相关连的那一段历史遗忘。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与强敌的争斗，其实也是一种记忆与忘记的争斗。”
谢谢西敏寺！他们以如此庄严、如此永恒的方式，在如此永恒的地方，在远比云南、远比中国边际大得多的视野，让全世界的人都把他、同时把他们记住了，让我们流血的悲哀和负疚终于得以释怀。

西敏寺已千年不倒。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座伟大的建筑再过一千年、两千年也不会倒掉。圣徒王志明将和它一起留在那儿，让人们记住并且景仰。这样，人们也就记住了文化大革命，记住了林昭、张志新、遇罗克……还有一切为神圣信念献身的圣徒们。

同样，当人们站在西敏寺景仰和纪念圣徒之时，加害于他们的“彼拉多”们，将注定同时并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2012年10月3日

□ 原载《昨天》第15期

~~~~~

## 【微观历史】

### 文革造反派的市民背景 and 知识背景

• 杜钧福 •

我说的文革造反派的市民背景和知识背景，是指市民阶层和知识阶层支持造反派并参与其中的现象。

文革期间，我曾去过四川，目睹兵团八二六派与红成派的斗争。当时保守派产业军已经垮台。其社会基础转而支持红成派。所以貌似造反派内部的斗争，实则原来造反派保守派两派斗争的继续。

所谓兵团八二六，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主体，因为八二六主要集中于四川大学一个学校。这个兵团成份庞杂，从他们的著名分团的名称“小教”、“交通”、“市交”、“财贸”、“街道工业”来看就可知他们属于什么群体。还一些分团以地域命名如“市北”、“市东”、“市西”，似乎由一些手工业工人（如拉板车的工人和建筑工人）组成。红成在攻击他们说，只有卖汤元粉子醪糟蹬三轮车的人支持他们，这算什么群众。他们所说大致不错。兵团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用以反击红成，说红成要把卖汤元的老大娘打成反革命。

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徐有渔回忆成都八二六和红成两派街头辩论的情况：“当时，成都第一号煽动家可能要数四川师范学院一个学生，他属于‘八·二六’派，在本校当然立不住脚。他单枪匹马作战，在成都最繁华热闹的春熙路的一个小楼上设置了一个广播站，每天晚饭之后广播。他不照稿念，对着话筒信口道来，滔滔不绝。照我看来，他的讲演内容全是陈词滥调、无

稽之谈。但他熟悉市民的语言，洞悉他们的心理，他的广播越办越受欢迎。最后发展成为一到黄昏，那里就万人空巷、听者云集。市民们吃罢晚饭，纷纷端一个小板凳坐在广播站下边，用心倾听，第二天则兴致盎然地议论此人报道的消息和他的观点。看到他影响日益增大，流毒甚广，害人不浅，‘红成’的人又气又急，但拿他无可奈何。我倒曾与他作对。他的广播站下面常贴有他写的大字报，我抓住他几个毫无事实根据，又无道理的论点痛加驳斥，想叫他难堪。但人们没有反应……”（《我的造反生涯》，《燕南社区》，2003）他的回忆反映了成都普通市民对八二六派的热烈支持，但他不明白原因何在。

后来也成为著名学者的秦晖当时是广西四二二的成员。他指出市民造反和学生造反的不同：

“连片的‘解放区’基本上是南宁市下层市民集中居住的老市区，其居民原来多从事传统行业，三教九流，历来被上流社会视为‘情况复杂’之人。造反的意识形态色彩明显淡化。”居民对意识形态并不感兴趣，满街的大字报多是指斥“权贵欺民”的具体事例，而且作者多为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关。他们的群体要求则多有十分明显的利益指向。

在“造反派”控制的这片地区，正规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淡漠，“江湖经济”则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在‘解放区’里也有强大的计划经济产业大军，就是广西四二二最有战斗力的工人组织‘航运工总’。但‘联指’认为，他们是由传统的个体船主经公私合营或合作化改造而来，并非真正的产业工人。”

草根阶层聚居的旧市区是“四二二”的根据地，而机关大院密布的新市区则是“联指”的大本营。设在新市区内的一些教科文单位如文化大院、水电设计院、二中与医学院等地方，“四二二”成员也居多数，……。（秦晖：《沉重的浪漫》，徐有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1967年7月16日，即著名的七二〇事件前夕，武汉造反派举行纪念毛泽东在长江中游泳一周年的活动。“钢二司学生和部分工人从汉口滨江公园上岸，整队游行到六渡桥，集结，乘车回武昌，沿途受到汉口市民箪食壶浆、夹道激情欢迎；市民见学生赤脚在热融的沥青马路游行，眼泪直下，纷纷脱下自己的鞋叫学生穿，或用水盆向马路浇水降温。”而对百万雄师的广播站喧哗、起哄、嘲笑。（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银河出版社，2005）

杨小凯则干脆将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称为“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他回忆在文革初期的长沙，“傍晚时分，一队不整齐的产业工人的队伍游行到市委，他们看去刚下班，穿着工作服，举着打倒三相信的标语。路旁的市民欢呼雀跃，我不禁热泪盈眶。”（《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地方文革史交流网，2009）

一位河南的造反派回忆说：“想起每天周围多少不知姓名的老太太送来又吊上去的那一罐罐饭菜，那时阶级阵线是那样鲜明，像这些城市贫民区都是造反派的‘解放区’，而省市周围则是保守派基地，全国各城市也大致相同于这个规律。”他说的老太太事是指向被围困的造反派据点送饭。（宛章欣：《也谈“文革”人性的扭曲》，凯迪社区，猫眼看人，2008）

我了解其它地区的一些造反派如天津大联筹也有类似情况。大联筹上街游行时，甚受市民的欢迎并参与其间，乃至万人空巷，好似节日的狂欢。其成份也比较庞杂，有电车红旗这样的骨干队伍。北京当时没有全市性的争论，1968年财贸尖兵和其对立面在西单商场的武斗，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在以后的历史事件中，市民阶层充分显示了对政治的高度热情和积极参与，他们崇高的献身精神为全世界所瞩目，早已载入史册。

在辽宁，群众组织分成三派。其中被认为是温和造反派的辽联的基础是机关干部，保守派辽革站基本上是产业工人特别是军工企业工人的联合，激进造反派八三一派的成员以服务业居多。大中学校师生则分属各派。

在贵州，最激进的造反组织是由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组成的红卫军和由建筑工人组成的赤卫队。而迁到三线的军工厂的工人，大多加入比较保守的支红派。

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所谓市民阶层，是相对于单位人而言。它有两个意义。一是非单位人。上面所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许多团员，特别是第三产业的，都不属于单位人。第二是指作为社会人的单位人。一个人在街道上的政治立场可能与在单位内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也算市民阶层。在那个时代，一个人往往在脱离单位以后才能彰显他的个性，用理性来判断是非。

例如在山西，夺权后一段时期，以刘格平、陈永贵为首的红总站压迫对立面红联站。而许多市民在街上支持红联站，被称为“马路兵团”。“马路兵团并不都是兵团（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或红联站的人，很多都是红总站的人。他们可能在本单位属红总站组织，但看不惯刘格平和红总站的所作所为，到大街上来声援红联站。”（李青山：《说出我的故事》，古道西风瘦马博客，2009）

在1967年的贵州，许多在职人员在单位参加官方组织的“支红派”，在社会上支持造反的“四一一”。“这样，在机关厂矿出现了上班时‘支红’、下班时是‘四一一’，白天‘支红’、晚上是‘四一一’，在单位上‘支红’、在社会上是‘四一一’等奇特现象。”（邓振新：《贵州文革大事记》，地方文革史交流网，2010）在锦州也有这样的“马路兵团”为造反的“糟派”助威。

云南印染厂一位造反派在社会造反，“但是在厂里我一直不敢起来造反，毕竟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俗话说：‘不怕县官，只怕现管’。”（《我的文革经历之一》，道童儿博客，2007）

1976年4月初的那几天，许多北京人到天安门广场去，都小心翼翼地怕被本单位人看到。此刻，他们只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

市民阶层属于边缘群体，没有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为社会所歧视。在文革前的主流话语系统中，视市民阶层为异己力量，用“社会闲散人员”、“社会渣滓”等含糊的贬义词来称呼。实际上他们之中无不含辛茹苦地挣扎求生。在将《白毛女》从歌剧改编为芭蕾舞时，也把杨白劳的身份从卖豆腐的小贩改为贫雇农。

在北京“红八月”中被残杀的所谓资本家李文波和他的妻子、六中红卫兵监狱中被折磨致死的工人徐霏田，王友琴女士笔下未留下名字的左奶奶和马大娘，都属于典型的市民阶层。

四川的红成派视“兵团”的成员不但不算工人阶级，连革命群众都不算。在山东，有人用一支顺口溜来讽刺造反派：“山东大地鱼鳞坑，黄河岸边铁壶声，大明湖畔炸油条，栈桥边上卖花生。”其中鱼鳞坑是讽刺王效禹脸上有麻子。其余几句指其部下分别从事过焊铁壶、炸油条、卖花生等职业，对这些职业的社会性歧视成为批判武器。现在仍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这一顺口溜，将第三产业视为低贱的行业。

徐州一位文革经历者也说：“总的成份划分看，支派主要是产业工人、机关干部和周边农民群众，而踢派成分则复杂得多，很多是对政权不满的基层街道混混”。（《文革经历》，共和国同龄博客，2007）

这也就说明了他们参加造反的理由。“在建筑和轻工行业，无固定工作者里‘主力军’占绝大多数，这是因为他们对待遇的不高和生活不稳定的不满，在其它行业如纺工，交通里的‘主力军’和‘联指’比例差不多，但在西门的老制造业工厂里如常柴厂，林机厂，拖拉机厂，机床厂等‘联指’人数要占大多数，这是因为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和不错的经济收入，使他们不愿意看到混乱的局面。”（《常州文革之回忆》，火流星博客，2006）

文化大革命给很多属于边缘群体的人提供了参与政治、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在无锡，一名“拱北楼”面店里的年青店员曹桂宝目睹学生和市委间的博弈，愤然在街头贴出《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大字报，引起街头辩论。他后来成为造反派的头面人物。（陆谓文：《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深圳论坛，2006）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不堪回首。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又是一座宝库，里面的信息量巨大，悬疑问题甚多，如拟探讨社会事件间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

□ 原载《共识网》

~~~~~

【风雨见证】

陈白尘的“文革”日记

• 散 木 •

一、一部几近“全本”的日记

笔者好读日记，最近又重阅了陈白尘的《缄口日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此前剧作家陈白尘于“文革”前期被打成“牛鬼蛇神”时所写的《牛棚日记》，已由三联书店出版，记得出版时曾火爆一时，但陈白尘“文革”后期所写的《听梯楼日记》，却一直未见单独出版，当然，这是事出有因的了。大象出版社后来合两本日记为《缄口日记》出版，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正如董健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所谓历史文献，是“回忆录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这是因为：回忆录是作者多年之后对记忆的重新“检索”与整理，有的东西早被遗忘，有的东西则被作者以“此时此地”的观点加以“筛选”，因而失去了许多丰富和复杂的“原生态”东西；日记则不同了，它往往保留着作者的一事之迹、一时之感，有些稍纵即逝的思想情绪的“火星”，也许因此会被文字固定在纸页上，因此我们可以说日记是文化考古学的宝贵资源。

陈白尘的“文革”日记，不仅真实记录了那个噩梦般的年代里文化名流们被触及皮肉的同时又被触及灵魂的“改造”过程，留下了一段真实的毫无伪饰的历史记录，又发人深省地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素材。前者，可谓留下了许多悲惨的记录：如其时北京的文艺界名流，“于村、赵慧深皆三次自杀而未果；孙维世最后以拒绝服药而死；金山则在卫戍司令部未释；蓝马妻子离去，人财两空；路曦一度精神失常”，其他各处的名流呢？“舒绣文、赵慧深、冯酷、徐韬、陈天国、上官云珠、孙维世、老舍等等，都是并无死罪而被迫自杀或折磨以死的！呜呼！”“夏衍腿折目盲，是禁闭时折磨所致；曹禺自方瑞逝后，神经一度分裂；金山放出后则独处一室，

燃红白蜡烛各一，以纪念与维世的婚礼和她的忌日；关肃霜自谓她以四小时写了四张信纸，花了四分邮票，换来了四年不自由；赵燕侠只因为不穿某女人设计的衣服，乃打入冷宫；李少春有高血压，去年忽然要他演猴子戏，大翻跟头，返家即病，遂死……这批当年的精英啊！”此外，关于“文革”中的许多谜案，如“五一六”，如“《总理遗言》”等等，作者都有所记录。至于作者自己所遭遇的问题——所谓历史问题的困惑，作者曾听说纪登奎在组织会议上讲：1935年之前在白区被捕且有一定问题的，一律按叛徒处理；此后毛泽东有所澄清：历史问题有过结论的，都应维持原结论；发现新问题的，属一般性枝节方面的不论，若重于旧问题的才另做结论，但要从宽从缓，等等。由此，整个“文革”中被牵涉者不知凡几，到了后来邓小平“出山”而大抓干部问题，曾提出以四个人为“样板”来代表四种类型：“以阳翰笙代表所谓‘叛徒’，以肖三代表所谓‘特务’，以聂绀弩代表所谓‘反革命’，以艾青代表所谓‘右派’，以进行彻底的复查和平反。”

以上的叙述，当然大可成为记叙“文革”历史的素材，然而，出于一些具体的原因，陈白尘的这部“文革”日记仍是一部摘抄本，而在最初出版的《牛棚日记》中，其中提及的某些人物是被隐去了姓名的，为此日记的整理者、陈白尘的女儿陈虹曾在后记中说：“为了不给更多的人增添麻烦，摘抄的内容仅为原文的十分之一。凡是文中有关议论他人他事之处均删之。”应该说，这对于有些读者而言是最不满意的，因为这要花费他们很大的精力去“考证”，甚至是“穿越式的想象”，而大象出版社的《绒口日记》部分恢复了日记的原貌，把一些隐去的姓名标了出来，省去了许多阅读时的障碍，这也是“版本学”应有的妙处了吧。

陈虹在《绒口日记》的校后记中又说：这部日记，从初版到合订本，“这十年来社会在不断地前进，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提高。回想最初编选《牛棚日记》时的情景，不觉可笑亦复可叹——其摘抄的内容不仅只为原文的十分之一，而且涉及到的一些人名均以××代替之。以‘恕道’而言，这一做法确实‘保护’了不少有一定劣迹的人物；但从‘史料’来看，则无疑是在‘掩盖’或是‘抹杀’这段噩梦般的历史。徐友渔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记忆即生命》的文章，他说：‘在暴力和邪恶过分强大，反抗已不可能或无济于事时，不甘凌辱的最后方式就是捍卫记忆。’因为‘记忆不但有维系生存、延续历史的作用，还和尊严、道义等价值准则联系在一起’。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尤其是站在讲台上面对着越来越多的连‘文革’是怎么回事也搞不清楚的学子们时，我不能不感觉到肩头担子的分量。虽说老祖宗们曾经围绕着当世人能否修当世史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我最起码的也应该为后世的修史者们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吧？——那些曾经被我删去的十分之九的内容，这次是没有机会补充了；但是那些个××们，则无论如何也应该恢复它们的原状。先哲们早就说过：‘知耻者近乎勇。’为了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留下‘过来人’的那些幼稚而又蹒跚的脚印，我的这一做法想必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吧。”又可谓信然。董健先生也在序言中说：这部日记，“为了出版，不得不把一些‘碍眼’的文字拿掉。为了‘现实’，人们不得不去‘遮蔽’一些什么。这是悲剧——人为什么不敢面对现实？又是喜剧——一旦‘遮蔽’被揭开，出洋相的总是‘遮蔽’者本人。”

笔者出于好奇，对照先后出版的这部日记，仔细检核那些隐去又出现的日记中的人物，可以说大多涉及“文革”中的各色人物，包括文联等单位中的“造反派”。那么，不妨公布一下这个名单，因为“社会在不断地前进，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提高”，对于历史，谁能全无幼稚，以及全无任何渣滓，而反省、忏悔应该成为我们灵魂中的应有之义，否则，我们何谈社会的进步呢？（其中的芸芸众生，兴许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则不过是当年被作者随兴点到，当然不能被认为是“定性”式的文字了，他们是：大、小“周明”，以及姚以铮、毛承志、郝芬、荣正一、高玉书、马继远、尹一之、杨志一、胡德培、雷奔、徐东晓、甘棠惠、杨九江、郑茂达、陈默、李基凯、许敏歧、刘德风、许翰如、冼宁、朱祖雄、王迪若、侯聚元、张会武、王葆华、方超、叶勤、谢明清、张开达、马肇元、邹正贤、陈忠经、刘小珊、张金禄、许以、田野、潘德润、王朝银、冯振山、杨五铭、孙琪峰、王光、孙德海、赵素行、王真、徐贻亭、朱革非、

祖秉和、柴鸿逵；还有阎纲、涂光群、葛洛、谢永旺、麦青、杨匡满、王文迎、古立高等。以上的一些人，多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其中的部分人参与撰写过《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等反思性的回忆文字。）

《牛棚日记》，笔涉今天“80后”、“90后”们所不熟悉的“干校”，当年中国作家协会下放湖北咸宁干校，其中包括了冰心、臧克家、张天翼、张光年、严文井、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葛洛等知名的作家，连同家属百余号人马，而最终倒在那片土地上的，侯金镜可谓是最为不幸的一个。张光年曾沉痛地写道：

多少个风雨之夜，我们从远处稻田摸黑回村，泥深苔滑，一路上跌跌碰碰，相扶而行。金镜是高度近视眼，穿大堤、过小桥、越沟坎时候，往往要爬着走一段。我当时也常闹笑话。回到宿舍，我是疲劳不堪了。金镜洗脸更衣后，照例把小马灯拨亮，坐在小马扎上，俯身床边细读《列宁全集》，直到深夜。

1971年8月8日，湖北农村的高温季节，一向患高血压症的侯金镜同志，因连续从事重体力劳动脑溢血猝发而无法救治，终年才51岁。他死的时候还背着“四人帮”强加于他身上的诸如“文艺黑线人物”、“反党喉舌文艺报”负责人、敢于咒骂林彪、江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些可怕的罪名。他死得太早，没能看到“四人帮”的覆灭，没能参加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斗争。

1974年12月，咸宁干校被撤销，“作协”没有结束专案审查和没有安排工作的人员被并入文化部天津静海（团泊洼）的“五七干校”，郭小川著名的作品《团泊洼的秋天》就是在那里创作的。一如有人所说：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下的中国文坛历来就是政治斗争敏感的神经和制胜的突破口，因此，中国作家协会十年“文革”中长达六年之久的干校生活构成了“文革”时期的一个缩略的人生，而陈白尘的日记于今天则不啻是重修“中国作家协会发展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第一手资料，王蒙先生也在《中国作家三代纪实》的序言中说：“我早就对文学机构说过，如果把他们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的历程写下来，会很有意义，很有故事，很有——刺激。”当然，有了陈白尘日记中的这些具体的故事和人物，想必更加会不同了吧。

二、“专案”是如何进行的

今本《缄口日记》的难得，还在于披露了一些本该“删节”的“桥段”。其实，历史往往是会呈现出荒诞的色彩的。就在日记作者记录并控诉了自己被莫名其妙地“专案”之后，出人意料，所谓剃人头者，最终亦被人剃了头，于是，陈白尘日记中就有了于悲愤中见幽默的一些情节（所谓“桥段”）。

那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却被莫名其妙地幽禁在北京民族饭店，此前他应邀来揭发历史上张春桥的“罪行”，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意外。“意外”，委实并不意外，那是彼时运动中惯用的一套方法，即使运动场上的各种角色其位置发生了变化，惯性使然，运动的作法仍然是传统的招数，此时主其事者，则是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了。

于桑，公安部原党组书记、副部长，他也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长期在保卫局、公安局、保安处、社会部等部门工作。“文革”结束时，他又参与组织审查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成员，为后来的“两案”审判奠定了基础。于桑还成功领导了“文革”中的几个大案，如“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西单爆炸案”、“人民大会堂窗户枪击事件”等。但是，在陈白尘揭发张春桥“罪行”的问题上，于桑暴露出他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这些问题无疑也可以反映出彼时在公安系统“审案”中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

由来已久，甚至可以在战争时期的“抢救运动”中见出端倪，于是，反思这些问题就不是那么轻松的了。

1976年10月，即当年的“红十月”之际，陈白尘在日记中记录了其北行的前前后后：

文化局来人，态度变得和蔼之至，大异。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局长召见，省委负责同志即革委会副主任召见，中央来电要我赴京写揭发‘四人帮’的材料，为省里立功，当夜出发，体检，血压升高，一时兴奋之故，加派省委组织部人员同行，软席车厢，不由回想起1966年9月11日第一次离宁赴京时的“起解”情景。

晚，办公厅刘局长来，甚热情，说请我来北京的原因是怕在南京不安全；任务则是写揭发“四人帮”的材料，要住一段较长的时间。目前暂不与外界接触，因阶级斗争复杂，一切以安全为重。

晚8时，正入浴，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于桑来访，急更衣而出。于态度潇洒，先问我是否认识他，然后则详细询问江青及张春桥在上海时期（1935—1937年）情况。张事问得较详——要我来京的目的大概在此了。但于对我所提供的江青同唐纳在六和塔的结婚照片的下落及1951年江对宋景诗历史问题的讲话大感兴趣，立索我在1951年所写的几页日记残片以去。

已经写毕的材料被告知不合体例，因改写。

张（春桥）的材料昨日已写完，共六个问题。

修改昨日所写的有关江青的单一材料。1966年写交代时恐群众追问，则把江青所说的话都推在了周扬身上；但同时又另附了一密件，要求只给中央看，说清周所说云云均为江所言。这一做法的目的，当时是怕江处于被动，但忘了她本人亦是文革小组负责人，是完全能够看到这一密件的——我是做了一件蠢事！但是没想到“塞翁失马”，如今它终于成了她的罪证了！要写的有关江、张的材料已经完成，但来京之前省委说要作三个月的准备，则以后干什么呢？

重写材料，重抄1951年日记，关于江对宋景诗“投降是其策略”的“指示”。

再留一个月。我要求给点工作做，肖说张的材料可再写份更详细的，我言有困难——已尽其全部记——再也写不出更多的东西来了！

江青专案组来人，问崔万秋情况，所知有限。1935年顷，我只知他是一个文坛上所谓的掮客之流，不了解他政治上的真面目；抗战后到重庆，他的国民党身份才完全暴露。

出示照片，江青和日本女子，男子有唐纳、崔（万秋）。

9时许，于桑等四人来，才知他们要会议室，并且派了一个不相识者召我去见，老徐亦破例列席，心中颇知有异。见面时，于先向我介绍了同来的某局长和某处长，我则与其一一握手。但言归正传后，口气便大不相同了，而且是一再重复要我打消“顾虑”。他的“王牌”随即摔了出来——一是14日那天给我看的照片，他们告知后排的那个男子，好些人都证明他是崔万秋，而惟有我说不是；二是我在材料上说，张春桥于鲁迅逝世后表现淡漠，但另有材料证明他仍有活动。对于前者，我说我没认出来，可能是用以后在重庆时的印象去印证，故不能肯定；对于后者，则可能是自己的记忆不准确了。但于及某局长则硬是以此为据，说我有“顾虑”。我情急

中顶撞他们道：“我不会把自己绑在四人帮的战车上的！如有重大问题被我隐瞒了，我可以用生命作担保！”于急说：“战车之类的话可是你自己说的！”遂不欢而散。回到515室后愤然垂泪。“文革”中自己被审查七年，在任何压力下未曾流过泪；如今我这个被“四人帮”迫害的对象竟反被无端地怀疑，实心痛也！片刻某局长又来我室中，命令道：最近勿与外界（包括自己的家人）通信。这是在施加压力了，默然应之。下午写一关于崔万秋的材料，空洞无物。虽不满意却也无奈。

昨晚老徐劝我头脑要清醒，则今日再改写崔万秋的材料及另外一份有关张春桥的补充材料，其实仍很空洞。没有想到像于桑这样的老干部，也不免有逼供式的行为！

将张春桥的材料交徐，请代转。同徐、瞿讲述了自己的心情，要求与家中通信。下午老胡来，说通信事已向上面请示去了。

江青专案组的二同志来，以“南国社”照片相示。是120相机的小幅照，已灰黄，约为1930年前所摄。以放大镜看之，其中三女人，一为黄大琳，一似俞珊，一可能是李尚贤。来人疑黄为江青，为其排除之。黄，易漱瑜之同学，易临危时以之荐田汉作续弦者，识之者少，几误断。

全国美展，一幅漫画画的是张春桥从苏州反省院中出来。闻之颇以为怪——难道瞿最终也相信了我在材料中所写的张并未被捕而在当时却一直不被专案组所相信的话了？

中央6号文件，张的结论，是特务而非叛徒，这证明我所写的材料是正确的。

“四人帮”第二批材料。张在1935年至1937年间，除与宋振鼎有关系外，只提了他与崔（万秋）的关系，而无其他的活动，这证明我的材料是可靠的。江的材料中，虽说她与崔来往密切，但也只讲崔如何捧她，而未提其他活动。想想于桑当时的态度，真恼于他的主观主义！

省委材料组，组织部，接至省公安厅招待所，北京来人。“四人帮”专案还未最后结案，还需继续做大量的工作。据称此次谈话将改变以往的方法——可以插话，可以讨论，并一再强调要我消除顾虑。

与张（春桥）的接触，彼插话订正。均是在某些小事上加以订正。如张在上海曾住过吕班路、薛华立路；我在搬出吕班路120号之后所租的房子叫幸福坊；在环龙路居住时的门牌是196弄4号，（张）天翼则住的是204号；张到上海是1935年5月12日，离沪是1937年9月15日；张在上海谈对象，我曾经向之提过意见；对于张认识崔万秋一事，我在向别人介绍张时还曾经提到过……这可都是我完全忘记了的，闻后大为惊异。在谈话开始时我曾说，在“四人帮”的第二批材料中，关于张到上海后的二年多时间内，除崔（万秋）、宋（振鼎）二人事外，是个空白。我在京128天未能填补它，实感遗憾。温欣然曰：“老陈，这个空白你应该努力填补上呀！”夜间反复思考，睡不宁。

今天又谈了一整天。我对老温说：“以前我对张春桥的材料有如走进了一个黑胡同，两眼漆黑，找不到一点线索。昨日的谈话，使我看到了一线光亮；今日的谈话，则如同大门打开了。”上午，他引出了我对张办的《文化新闻》的回忆；下午，又从朱凡等人在夏令配克电影院从事难民救济等事联系到了张在“八一三”后的行为等等。晚饭前，他提出了四个问题让我思考。饭后又增加了张静庐的上海杂志公司一事，以及有关吴稚晖的一些情况，共六题令作回忆。老

温在谈到张春桥于解放后同我第一次见面的情况时说：“张当时为什么要回避你？害怕你？这是因为你知道他的底细——介绍人问题、杂志公司问题，特别是他与崔万秋的关系问题，只有你知道呀！”接着他又提醒道：“江青为什么要找黑大汉？要找当年在环龙路为她烧饭的女工秦某？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她的底细！老陈，你不能太书生气啊，你现在是应该积极进攻了！”心中颇感奋然。

晨起即写材料，除去张春桥化名狄克写文章向鲁迅进攻一事因不了解情况无从下笔外，共完成了五份材料……

以上日记的片断，足以说明当年政法系统断案中存在的问题了，特别是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的审案，因为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免不了会采取“传统”（肃反、抢救等等）的“经验”，而日记中关于历史上江青、张春桥等等的若干问题，其实如今多已获得澄清，如其为“叛徒”等等，确实是“过度阐释”了（见《炎黄春秋》等等的文章，包括日记中提及的崔万秋，也有文章指出其并非是“文化特务”云云）。又如当年张思之在公审“两案”时是李作鹏的辩护律师，他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辩护，最后终于除却了李的两条罪名：另立中央、企图暗杀毛泽东，事后李作鹏表示感谢，他告诉张思之要在二十年后赠其一诗以谢，后果然如愿，李将一诗馈赠给了张思之：“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对此，张思之诠释说：“所谓‘公正、无偏’，在那个年代，承办那样的政治性大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个中况味，天人共知。”

好一个“个中况味，天人共知”。看来走上法治的大道，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 原载《随笔》2013年第2期

~~~~~

# 【记录在案】

## 报告有关四五运动的一些情况

• 刘传新 •

〔说明：关于（1976年）天安门事件，当时的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首都体育馆作过一个题为《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报告。当年十月，四人帮被捕，刘传新在年底自杀。这个报告，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天安门事件的真实情况有一定帮助。本文根据当时的记录整理。〕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市委统一部署指挥，依靠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紧密配合，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支持，迅速粉碎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及时作出了两项英明决议，由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为了使大家了解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彻底追查反革命，现在把有关情况分作五个问题，向同志们作个汇报。

◇ 第一个问题，阶级敌人是如何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疯狂表演的。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暴乱，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反革

命狰狞面目的大暴露，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大表演。

这一事件是全国解放以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其严重性在于：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门广场，三是又烧又打。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疯狂表演，采取了反革命的两手，从三月底开始，到四月五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发展的过程看，大体有三步：

第一步，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敌人进攻的方式是比较隐晦的。他们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含沙射影地诽谤中央领导同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三月三十日上午，北京市机械配件公司宣传干部曹志杰等人，盗用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名义，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份所谓“悼词”，别有用心地叫嚷要“披荆斩棘”，“血战到底”，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些反革命分子如获至宝，用打电话、写信、传抄、围观等各种方式，大肆渲染，无耻吹捧。当天，还有一个坏家伙，采用念“悼词”的手法，当众造谣说“中央有人反对总理”，进行反革命煽动。接着，写影射攻击的“悼词”、“祭文”、“挽联”等情况大量出现。

四月二日上午，中国科学院一〇九厂常存玉、宋胜均等人，到纪念碑送了四块近一尺宽、六尺高的反动大诗牌，用铁丝绑在纪念碑座的最高处。上面别有用心地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制造反革命舆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首反动诗第三句中的“倘若”二字，原来写的是“既出”，他们觉得太露骨了，又把它改为“倘若”二字。这四块反动诗牌，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愤慨，当即有人质问：“你们写的是什么意思？！”他们作贼心虚，吱吱吾吾地回答：“这不好说，这不好说。”反革命分子对这四块反动诗牌也极力吹捧，有的还谱成歌曲，在广场教唱，大肆传播。

这四块反动诗牌在广场纪念碑一摆出来，什么“白骨精”、“闪鬼影”，“擒妖魔”、“斩鬼怪”、“挥刺刀”、“剑出鞘”之类杀气腾腾的反动叫器，顿时增多。一篇署名“薛战”（实际是“血战”）的反动誓词中写道：“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把刺刀给敌人准备好了，我们也把自己的头颅给敌人准备好了。我们是一定胜利的，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再来到纪念碑前，用敌人的头来祭您。”听！这不是阶级敌人在磨刀霍霍吗？

那些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摇唇鼓舌的反动文人、跳梁小丑，也跑了出来，大加表演。什么“呜呼噫兮悲哀哉扫墓有感”啦，什么“野心家祸国殃民生不如死”啦，什么“有人阴谋杀害周总理，西伯利亚的严寒挣扎不了很久啦”等反动诗词，纷纷出笼。有个冒充“红卫兵”的反革命分子，写了一首打油诗，攻击什么“北大不大中华大，清华不清八亿清，斩尽妖魔祭英灵，自有革命后来人”。这首打油诗与悼念周总理毫不相干。谁都知道，清华、北大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亲手培养的光辉典型，他们攻击清华、北大，实际上就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有个反动家伙，在一篇所谓“墓前抒怀”的《七律》中，极力发泄反革命仇恨，写道：“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夜半妖星寒气重，关山座座锁清明。”这首反动诗的矛头所向，不是也明明白白吗！

第二步，也就是四月三、四两日，阶级敌人感到再用隐晦的手法已经不够劲了，便抛去伪装，撕掉面纱，明目张胆地书写反革命诗词，张贴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发表反革命演说，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嚣什么“秦皇的封建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极端恶毒地咒骂“善始无终君主多，伟业败绩一身合”。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是什么“阴谋家”、“野心家”，叫喊“骨灰未寒妖风起，吠日恶犬狂叫急”，“赫鬼再演红场戏，擒来奋斩祭周公”。反动气焰，令人发指。

同时，他们公然无耻吹捧邓小平，为邓小平涂脂抹粉，鸣冤叫屈。说邓小平上台后是什么“面貌大改观，领导下基层，抓纲又抓线，任务明确方向对，很短时间卫星上了天。”还说什么“老革命，老革命，可怜大权旁落去，到头来落得个走资派、牛鬼蛇神。”

总政管理局电工、反革命分子赵清芳，冒充清华工农兵学员，一手拿着白花，一手拿着反革命传单，造谣煽动说：“就是这样一朵小白花，他们也不让我们拿出校园，就是这朵小白花，也不让我们扎啊！我们只能到校外扎成这朵平常的、普通的白花，把我们全部的爱，金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之中”。请看，这个家伙多么卑鄙无耻，竟然栽赃诬陷，这哪里是在悼念周总理，分明是在搞反革命煽动。就是这个反动家伙，还在反动传单上连写三句“敬爱的周总理，您是能理解我们的”，简直是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极大侮辱，真是反动透顶。还有的反革命分子冒充“梁效”、“任明”等名义，写诗作词，甚至手捧所谓“血书”，声嘶力竭地进行反革命煽动。

有些反革命分子，混杂在人群当中，上窜下跳，鬼哭狼嚎。有的围着念反动诗词的家伙，拍手狂叫：“好！好！用记录速度，再来三遍！”有的狂叫：“谁反对周总理就把他们揪出来，在纪念碑前绞死他们！”“挖他的心，尝他的肉”。有的拿着录音机，进行录音。广播事业局有个家伙，连续四天去广场，专录反动演说，还挑选最反动的诗词，自念白录。还有些家伙，专门拍摄反革命的镜头。他们狂妄地说：要把这些所谓“史无前例的盛况”，作为“历史的一页”记载下来，以便扩大反革命影响。但是，今天已经变成了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有力罪证。

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出现在纪念碑周围的各种反革命毒草就有四百多起，其中有一半是四号一天抛出来的。这里面，有反动诗词、传单、标语，有反动散文、快板、顺口溜，有反动呼吁书、倡议书、誓词，有反动歌曲，还有反动政治笑话。真是形形色色，乌七八糟，无奇不有。突出的是书写反动诗词，占全部反革命毒草的百分之七十八。有旧体诗词，有新体诗，还有文字游戏的宝塔诗。旧体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旧体词有《清平乐》、《满江红》、《忆秦娥》、《抛球乐》、《诉衷情》、《江城子》、《十六字令》、《西江月》、《卜算子》、《石州慢》等二十六个词牌。他们利用这些形式大作反革命文章，可算是用尽了反革命的心机，要尽了反革命的伎俩。有个反革命分子，经过精心琢磨，炮制了所谓“四绝字头”的反动诗，共十六句，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念，就是：“怀念总理，良弓不离，誓除魔患，神州称奇。”真是绞尽了脑汁。

有些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分子，也把魔爪伸向天安门广场。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毒草，无论是含义情调、引用典故，还是表现手法，都是煞费苦心的。有个反革命分子用《石州慢》这个词牌作词，发泄反革命仇恨，恶毒攻击什么“朝堂尽鼠辈，奸权横操同室戈”。用《石州慢》这个词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边也有大文章。据说，北宋有个叫张元干的，作过朝廷命官，他因为秦桧当国，不愿和奸佞同朝，弃官而去。后来惯用《石州慢》这个词牌作词，发泄对当时的统治的悲愤。今天，反革命分子选用这个词牌作文章，显然是把自己比作张元干，借以发泄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用心十分险恶。湖南省桃江县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家伙，挖空心思地用人物画组成一幅反动对联，让人专门带到北京，贴到天安门广场，蓄意诽谤中央领导同志，手段极其恶毒。

第三步，就是五号这一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不但继续使用大造反革命舆论的这一手，又施展了反革命暴力的一手。他们在三、四两日遭到打击之后，狗急跳墙，凶相毕露，又烧又打，又抢又砸，甚至冲击人民大会堂，威逼警卫战士降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反革命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拿打来说，他们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警卫战士，打革命群众，像地主“还乡团”一样，穷凶极恶。被他们打伤的，就有二百七十五人之多。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

有的眼睛被打肿，腿被打骨折，鼻梁骨被打断，有的耳朵被撕裂。对交通广播车上的宣传员、救火的消防战士，他们也不放过，围攻殴打。过路的群众说了几句义愤的话，也惨遭毒手。他们不仅打中国人，还围攻殴打外国人，蓄意制造国际事端。被打的外国人就有五名之多。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田索竹彦，被他们打得满脸是血，两架照相机和钱包、证件都被抢走。在这些行凶作恶的亡命徒中，就有姚登山的儿子姚健，他也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怀里揣着反革命传单，窜到天安门广场，大打出手，煽动一伙人，殴打公安人员，狂叫“打便衣”，“打密探”，“打死他！打死他！”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

他们烧了一些什么呢？烧毁汽车四辆，砸毁宣传车、救火车各一辆，烧毁自行车近百辆。他们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放火，把营房里的大量家俱、衣物扔进火堆。甚至扬言要“火烧天安门城楼”。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坏事，但也变成了好事。暴露了敌人，教育了群众，使人们擦亮了眼睛，进一步认清了邓小平的反动本质，彻底戳穿了敌人所谓“悼念总理”的大骗局。

◇ 第二个问题，我们是怎样同这伙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

大家都知道，清明扫墓是个旧习惯，早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就要求破除，市委根据群众的意见，曾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清明时不再进行扫墓活动，经周总理亲自批示，中央批准，并在全市进行过工作。今年清明节周总理逝世不久，广大群众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进行悼念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阶级敌人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蓄意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进行斗争。

怎样进行斗争的呢？总的说来，敌人有个暴露的过程，我们也有个认识的过程，只能根据当时情况的发展，遵照中央的指示，采取相应的对策。大体做法是：

第一，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认真做好工作。三月三十日，在广场上出现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影射攻击以后，市委立即对敌人的动向进行了分析研究，四月一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号召全市人民提高警惕，严防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四月二日，传达了中央处理南京政治事件的电话通知，戳穿了敌人的阴谋。经过工作，绝大多数单位和群众，提高了认识，看出了“花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顶住了这股反革命逆流，没有受骗上当。有些原来要做花圈，送花圈的群众，就不做，不送了。这样，不但孤立了敌人，也为后来的反击，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统一部署指挥，密切掌握敌人的动向。这次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群众怀念周总理的心情，混杂在群众中，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作掩护。根据这种情况，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紧紧抓住战机：揭露和打击敌人。但当时民兵、民警也不能公开出面，维护广场秩序，如果那样做，就会使敌人的活动合法化，在客观上起到支持敌人的作用。为此，在市委领导下，组织了统一的指挥部，抽调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在现场分片包干，隐蔽进行观察，把阶级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起来，为开展反击做好行动上的准备。

第三，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就地揭露和打击敌人。三、四两日，敌人已经充分暴露，我们当即采取措施，给以迎头痛击。一是依靠群众，当场揭露批驳；二是盯住敌人，相机扭获；三是现场取证，抓紧查获；四是对出现的反动诗词标语，当日除掉。在这几天中，共获取实物罪证二百多件，把干得最凶的抓了几十个，及时打击了敌人。

第四，移走花圈，不给阶级敌人继续活动的场所。四日清明一过，就连夜把花圈全部移出天安门广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说，天安门事件是由于对花圈处理不当而引起的。事实很清楚，五号以前敌人活动那么猖狂，花圈并没有移走嘛！那么，清明已过，花圈如果还不移走，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不是等于纵容、支持敌人继续搞反革命活动吗！毛主席早就指出：“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对这伙反革命暴徒，并不存在刺激不刺激的问题，他们为了搞反革命暴乱，总是要制造各种借口的。

第五，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展开反击。在三、四两日，敌人遭到打击后，到了五日，这帮家伙的狰狞面目更加暴露无遗。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断然措施，进行反击。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坚决实行镇压。当时，在天安门广场聚集有十来万人，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是受蒙骗的，搞反革命活动的只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打乱仗，伤害群众；又不能畏首畏尾，不敢下手。为了把大多数群众与一小撮坏人分开，吴德同志在下午六点半发表了广播讲话，明确指出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戳穿敌人的阴谋，号召群众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骗上当。大多数群众听到讲话就立即离开了。当好坏人坏人大体分清以后，市委一声令下，五万名严阵以待的首都工人民兵，手拿自卫木棒，浩浩荡荡地开进天安门广场，顿时士气大振。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密切配合下，把继续在广场负隅顽抗的二百多个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嫌疑分子团团围住，隔离开来，进行审查。这伙猖獗一时的坏蛋，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充分暴露了阶级敌人的虚弱本质。广大人民群众对首都工人民兵的反击拍手称快，连声称赞：好！好！好！

◇ 第三个问题，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怎样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起来的？

第一，大造反革命舆论，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思想基础。早在去年七、八、九月，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社会上谣言四起时，这伙反革命就与邓小平一唱一合，紧密呼应，煽阴风、点鬼火，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造谣诽谤中央有什么“老派”、“新派”，“温和派”、“激进派”。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和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制造所谓“总理遗言”，胡说什么“批邓就是反周总理”，妄图制造混乱，扭转批邓的大方向。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最猖狂的，就是那些散布谣言最凶的家伙。反革命政治谣言泛滥的单位，群众思想混乱，批邓就批不起来，坏人活动嚣张，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也跳得最高，干得最凶。

他们无耻地吹捧邓小平，为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大造舆论准备。当去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时，这些家伙就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认为只有邓小平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胡说什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们预感到末日来临，拼命顽抗，诬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什么“天骤变，乌云布，起阴风”、“突如其来”，“争权夺利”；攻击批邓是什么“无端弄笔出诽言”，“用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以反倒退的名义搞倒退”，“是把老干部打下去的信号”等等。他们竭力为邓小平辩护，胡说什么“搞阶级斗争阻碍生产的发展”，“抓不住老鼠的猫能是好猫吗？”说邓小平被批判是“遭了暗算”、“坐以待毙”。有个反革命分子竟疯狂叫嚣说，他要是邓小平的秘书，就要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毒手。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散布邓小平是什么“党政军全拿得起来的唯一的人”，“当然的接班人”，还造谣说，邓是周总理“提议的总理接班人”。直到天安门广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妄想“对中央施加压力”，“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

他们恶毒攻击大好形势，制造混乱，以便混水摸鱼。用林彪《“571工程”纪要》中的恶毒语言，攻击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是什么“政局不稳”，“经济搞得乱七八糟”。还诬蔑现在是什么“山河变色，虎狼猖獗”，“五洲峰峦暗，环宇竟哀鸣”，是什么“风雨飘摇水火深，四方黎民不安生”。煽动“有志不如趁势”，要“在这急风暴雨到来的时刻”充当“英雄”，要“不怕风险，



不怕杀头”，用“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亡命精神”，“大干一场”。

他们还为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暴乱直接制造舆论，别有用心地进行反革命煽动。散布什么“周总理逝世时悼念活动受到了限制，群众的意志没表达出来”。公然叫嚣到清明节“要用花圈表达出人民的意志，有热闹可看”。在清明节前夕，他们大肆传播所谓“总理遗言”，故意歪曲南京事件真相，造谣说“南京有几十万人上街示威”，“全国已经乱起来了”，胡说中央对南京事件“态度很软”。还造谣广州有人在大街上召开会议，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公安局也不敢抓人等等，为制造反革命事件大造舆论。

第二，组织上早就互相串联，结成了帮伙。

在天安门广场跳得最高，干得最凶的，台前幕后都有一帮子人，已经查明的就有几十伙，少者四、五人，多者几十人。从初步调查的情况看，他们搞组织串联，大体有以下集中情况：

一是策划于密室，搞“裴多芬俱乐部”，早已结成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分子徐漓，在去年就与本单位的一些人结成同伙，经常在一起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从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四日，他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宣传，并精心策划在厂内贴出十八条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嚣什么“誓与党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策应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活动。他们还供认，阴谋搞四〇火箭筒，伏击红旗牌轿车，对中央负责同志下毒手。

一种是早就纠集一伙人，在天安门广场又乘机扩充或建立新的反革命组织，打出所谓“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全国罢工委员会”“临时造反委员会”“杀妖战斗队”等旗号，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网罗党羽。反革命分子侯玉良，从今年一月开始，就搞反革命串联，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又积极物色对象，发展反革命组织，采取特务手段，规定联络暗语，建立单线联系，炮制反动地下刊物《大众报》。先后网罗几十人像林彪的小舰队一样，开列了名单，划分为骨干、可靠和不可靠三类。四月五日早晨，侯玉良一伙在纪念碑周围贴出“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通知”，发表反革命演讲，用半导体话筒声嘶力竭地叫嚷“火烧得越旺越好”，带头指挥冲击人民大会堂，还组织了五名所谓“谈判代表”，侯玉良自命为“首席代表”，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后，他们又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转入地下，侯玉良与同伙总结三条“失败的教训”：一是没有联合起来，二是大学生没有发动起来，三是没有一个像样的首领。还给同伙打气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什么“进军的第一炮”，是解放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力量，“妄图卷土重来”。

一种是到外地搞反革命串联。炮制反动诗词、造谣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反革命分子周忠铉，今年一月到桂林参加四机部召开的业务会议时，与上海、河北、广西、四川、贵阳、南京等省市一些工厂的十五、六个技术人员串通一气，传播了大量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周忠铉还和其中的五个人集体收听敌台广播，记录敌台伪造的所谓“总理遗言”。回京后保持联络，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种是外地的坏人来京搞反革命串联。吉林省劳改释放的坏分子李广德，三月二十日窜来北京与一内蒙来京的坏人王铎勾结在一起，串通了十六、七个所谓上访人员，从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接连召开了五次黑会，密谋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所谓“呼吁书”“告上访人员书”，叫嚣到北京“不是来烧香的是来拆庙的”，“贪官我也反，皇帝我也揪，不拆城隍庙，宁死不回头”，煽动要组织起来，到中南海静坐、绝食向中央施加压力，冲击中南海。

第三，到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活动，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就拿第一个在纪念碑贴出影射攻击“悼词”的反革命分子曹志杰来说，早在三月十三日就纠集同伙，密谋策划，先后开了四次黑会，指定专人起草悼词。三月底写出悼词之后，他看了嫌太平淡，“没劲”，特意加上“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等影射攻击的反动词句。四月二日还到北大法律系进行煽动，遭到工农兵学员的驳斥，市总工会要他揭下反动悼词，他坚持不揭，后来看形势不妙，又私下对同伙说：“先退回来，等待时机以后再进攻”。

在天安门广场猖狂表演的这伙反革命，幕后也大都有人煽风点火，出谋献策，在天安门广场用半导体话筒宣讲反动诗《今日在何方》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早就呕心沥血地炮制了反动诗词，并四处拉同伙，请军师。有个宣传部门的人为他写的诗反复琢磨，一边修改，一边赞赏，并陪他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还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他的诗修改了三天，凡恶毒攻击的字眼，都用红笔划出来，肉麻地写道：“大作拜读，构思巧夺可取，感情真挚，有激情”，并为他献策说：“应写得含蓄一点，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让别人看得出来，又不能让别人抓住，望君注意”。还有个家伙为他出谋划策说，如果公安局把你抓住，你绝不能承认攻击中央的，因为你的诗从字面上怎么解释都可以。

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闹得最凶的单位，大都有领导人纵容支持，直至亲自出马，中国科学院109厂送四块反动诗牌和花圈的活动，就是在某些领导人参加下精心策划的，他们早在一月底就酝酿清明节送花圈，二月买纸作准备，三月中旬制定了花圈图案，经某负责人批准制作，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反动诗牌做得越大、越醒目，越好”。他们一共做了四个花圈，两个给周总理，一个给陈毅同志，一个给杨开慧同志，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有一个家伙，在制作花圈的时候就说过：“准备被抓起来坐牢”。三月三十一日，他们还专门开会研究送反动诗牌“走那一条路影响最大”，确定绕道走“外地人多，外国人多”的王府井，路过北京饭店送往广场。四月一日，该厂一些领导人亲自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窥测形势，并抄录反动诗词，回去进行煽动。四月二日上午，这个厂的领导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设计了一个所谓批邓大会，会上只有一个人发言，接着煽动组织了三百多人，指定了正副总指挥，从工厂所在地德胜门外祁家豁子出发，用四辆汽车在头前开道，抬着花圈，举着诗牌，招摇过市，到北京饭店门前故意停留了五分钟，以便让外国人拍照，他们还指定专人把送反动诗牌的各种场面都一一拍成照片，蓄意扩大反革命影响。还有一些单位也有类似情况。

◇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突出表现，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修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疯狂反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挂帅人物。一小撮阶级敌人胆敢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暴乱，就是因为有邓小平在那里挂帅，给他们撑腰。

大量事实充分证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完全是邓小平一手挑起来的。邓小平重新生工作不久，一旦大权在握，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党发起全面进攻，拚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妖风，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一举，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纷纷聚集在这面黑旗下，亦步亦趋，紧密呼应。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叫嚷什么：“春天来了，空气新鲜，精神爽快”，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光明路线”，争当吹鼓手、马前卒。邓小平大造反革命舆论，争夺“思想阵地”，带头制造政治谣

言；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拼命摇旗呐喊，为其篡党夺权做舆论准备。邓小平大叫“各方面，问题都很严重”，“积重难返”，一再部署要“全面整顿”；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鹦鹉学舌，大肆叫嚷各方面问题“日久积年”，“不下重药，恐难收效”，必须“大刀阔斧”，“改弦更张”。邓小平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修正主义口号；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狂叫“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邓小平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胡说什么“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狂叫要“真正的马列主义”，“要打倒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所有这些，都清清楚楚地表明，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完全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是邓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的必然恶果。

大量事实还充分证明，邓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复辟愿望；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暴乱的这伙反革命分子，就是邓小平反革命复辟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让我们剖析一下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被抓获的都是些什么人物，就看的更清楚了。

一种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切齿痛恨。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兴高采烈，得意忘形。邓小平受到批判，他们兔死狐悲，狂叫要“豁出去”，要用“希特勒的胆量和冒险精神”，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有一个老子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人，在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几乎全家出动，东窜西跳：这个家伙拿着半导体喇叭，站在广场纪念碑的台阶上，声嘶力竭地朗读他自己写的反动诗，他妹妹、未婚妹夫和姐夫在一旁观战，他哥哥在一旁给他拍照、打气，不断叫好，煽动他“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如，搞反革命组织的齐国治，文化大革命中是混进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因思想反动，搞打砸抢，被拘留审查近两年，一直怀恨在心。这次跑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串连，妄图成立“全国罢工委员会”，狂叫要“占领电台”，“左右中央”，“把邓小平抬出来”。

再一种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阻碍了这些人升官发财、成名成家的道路，他们恨之入骨。有的就直言不讳地说，邓小平搞物质刺激，白专道路，扩大三大差别，“能给自己的家庭和个人带来好处”，可以“住上好房子，找个好工作”，在城市“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反革命分子周忠铨，早就幻想成名成家，一心盼着邓小平当权，说，“只有邓小平上台，才有出头之日”，还说什么“不管什么路线，只要能提高工资，提高生活水平，能成名成家就行”。对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十分反感。他除了进行反革命串连外，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还连夜书写五首题为《清明有感》的反动诗，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公然写出“东风无力”，“坑灰未冷”，“煎豆相煎”，“王莽篡权”的反动词句，恶毒地进行攻击。还有一个参加冲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营房的坏家伙，认为只有邓小平才重用象他父亲那样的“技术干部”，邓小平不垮台，他父亲“还有提拔的希望”，“自己也有出头之日”，因而希望天安门广场事件闹得越大越好。

还有一种是受过打击，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有的本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有的是多次被关押的罪犯。他们唯恐无产阶级的天下不乱，早就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又苦又涩”，“简直无法忍受”，“咬着牙根活着”。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本能地感到给自己带来了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在邓小平的身上，疼在他们心上。这些家伙反革命本性大发作，也跑到天安门广场推波助澜，趁火打劫。前边说的吉林的李广德，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家伙四十岁，十三岁就开始犯罪，曾被判刑两次，加刑一次，劳动教养一次，现在还戴着坏分子帽子。就是这样一个坏分子，也跑到北京来搞反革命串连，在天安门广场“大显身手”。再如，被开除党籍的蜕化变质分子姬传贤，四月四日纠集几个人到中山公园，策划成立什么“工农兵反修红旗兵团”，公然提出“取消阶级，不要成分，放出罪犯”的反革命口号。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反动阶级要实行复辟，总要推举他们的政治代表，作为他们的领袖和靠山。而反动阶级的代袭人物，必然要提出和推行一整套反动纲领和路线，作为“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把一切反动势力集合在这面黑旗之下。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按照邓小平的煽动，跟地主“还乡团”一样，又烧又打，疯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有的还直接向邓小平“上书”，献计献策，说什么“君若姑息，身必自危”，要邓小平“奋袂而起，登高而呼”，“组织起自己的人和他们干”。有的甚至狂叫“干柴已备，待点燃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自己比作“干柴”，把邓小平当作反革命邪火的“点燃者”，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出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后台和打手、主帅与喽罗的密切关系。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显，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亲自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必须进行到底。

◇ 第五个问题，帝修反和国内地主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

这次，邓小平挑起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闹得最凶的时候，帝修反特别是苏修新沙皇，喜形于色，兴高采烈，认为他们所谓的“中国的健康力量”，这一回可要“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来了。克里姆林宫从四月七号到现在，一直忙个不停地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什么《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汽笛报》，还有“塔斯社”、“和平和进步广播电台”等等，又写文章，又发报道，又登照片，不遗余力地给邓小平撑腰打气，说什么邓小平的路线受到了“热情支持”，很多人“要求邓小平当总理”。过去，苏修新沙皇曾经寄希望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幻想都破灭了。这一回又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满以为就要成气候了。可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还没来得及鼓掌，这股反革命逆流就很快被粉碎了，邓小平也完蛋了。勃列日涅夫之流大为丧气，情不自禁地叫喊，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令人吃惊的”，是“感到失望的”。于是便歇斯底里大发作，叫嚷：“邓小平被撤职不是内战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五月十八日，苏修“塔斯社”这个造谣公司，瞪着眼睛说：“上月底，枪毙了一个天安门广场游行的参加者，十人游行被法院判处了十年徒刑”，这是多么拙劣，多么卑鄙！苏修对天安门事件这么热心，一喜一惊，一捧一骂，无耻造谣，就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总是把赌注压在党内走资派身上，邓小平这一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也错误估计形势，欣喜若狂，兴风作浪。就连盘踞在台湾的政治僵尸蒋经国，也像扎了一针强心剂一样，有气无力地嚎叫起来。四月六号，也就是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第二天，蒋经国就急不可捺地在伪立法院会议上叫嚷，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什么“大陆同胞抗暴行动的新开始”，狂叫要给予“全力支持”，还提出所谓“特别预算”，“全力供给”。四月七号，蒋经国又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制定所谓“精神入党”办法，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叫嚷什么“大陆所有同胞不分地域，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信仰”，都可以“自动地成为中国国民党的精神党员”。台湾、香港的反动报刊、电台，也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动文章和广播，造谣诽谤，攻击诬蔑。狂叫“现在是反共的良好时机”，煽动要“发挥冒险犯难的精神，开展大陆工作”。邓小平挑起的这场反革命暴乱，连蒋帮都这样卖力地吹捧，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一些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还有那些老右派，也从阴沟里爬了出来，暗中庆幸，大放厥词。当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的时候，他们手舞足蹈，妄想变天，胡说什么现在是“形势不稳”，已经是“一触即发”，“现状不好维持，局面不好收拾”，“前途演变正未可知”，甚至叫嚷什么“政权也得变一变了”。有的使劲地吹捧邓小平“威武不屈”，“真有骨气”。请大家听一听，这是什么腔调，这又是为什么？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一小撮阶级敌人遭到灭顶之灾，不甘心失败，仍在垂死挣扎，继续较量。从四月六日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近百起反革命案件，与往常相比大约增加五、六倍。其中，针对中央两项决议进行捣乱破坏的，就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四月十一日，七〇六厂有个反革命分子，在厂里公开跳出来狂呼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中央两项决议，被制止时竟接连对三名职工拳打脚踢，疯狂地行凶报复。四月十二日，北京粮食局马连道仓库有个反革命分子，公然打出“要造反”的旗号，狂叫“文化大革命坑了我，也坑了邓小平”，穷凶极恶地闯进办公室，接连砸坏了三张办公桌。四月十四日，中央民族学院有个反革命分子，竟在集体宿舍，公然将《党的基本知识》一书中引用的毛主席教导，全部涂毁或撕掉，并当众书写了三条反革命标语，为邓小平扬幡招魂。四月二十日，从太原市流窜来京的反革命分子尚久大，跑到前门大街，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恶毒攻击周总理，无耻吹捧邓小平，狂呼反革命口号，当场被工人民兵抓获。五月一日凌晨，从新疆潜逃来京的反革命分子李林泉，连续在前门、西单、王府井、南长街等八个地方散发反革命传单，公然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邓小平和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进行辩护，当夜被北京站民兵、民警抓获时，从他身上搜出了同样的油印反革命传单三百九十三张，反动日记三本，已投寄给中央一领导同志的反革命信件底稿十四份。五月七日，大兴县一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子弟，连续书写五条反革命标语，疯狂叫嚣“坚决支持右倾翻案风”，胡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徒的活动是什么“自己解放自己”。五月十七日，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子弟王益民，从山西跑来北京，明目张胆地要往天安门东标语塔上贴反革命大字报，以《不理解这个纲》为题，猖狂攻击以阶级斗争为纲，胡说什么“为何以粮为纲，是不是有总纲、大纲、小纲，游击纲、临时纲”，“这究竟是不是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这个家伙被抓起来以后，还继续攻击，无耻吹捧邓小平“当个总理也应该”，诬蔑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故意闹意见”，攻击我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犯了错误”，咒骂社会主义制度“不自由，不如过去那样：海阔由鱼跃，天高任鸟飞”，猖狂叫嚣“来京的目的就是为邓小平翻案”，“制造第二次大混乱”。这个反动家伙还恬不知耻地说：“大丈夫要有沉机独断之志”，“青云有路终需上，宇宙无名志不休”，“不能留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真是反动透顶。

上述这些情况，对于我们认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颇有启发，耐人寻味。对这一反革命事件，谁支持，谁反对？对粉碎这场反革命暴乱，谁害怕，谁高兴？对邓小平搞翻案复辟，谁赞成，谁抵制？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吗！

同志们！今天向大家汇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二十六号文件精神，掀起一个继续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具体地说：一是要学好。就是继续认认真真地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加深理解，武装头脑，掌握强大的思想武器。二是要批透。就是狠批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罪行，进一步认清邓小平的反动实质，提高觉悟，划清界限，肃清流毒。三是要深追。就是认真追查反革命，前一段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发动群众，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形势很好。截至五月十日，全市共揭发出可疑线索两千多件，有近七千人，主动交出抄录的反动诗词和所谓“总理遗言”近四万件，交出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拍摄的照片、底片四千多张。特别是所谓“总理遗言”这起反革命谣言，经过在全国开展追查，制造者已经有了着落，可以不再追查制造者了。但是，追查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反动诗词、传单和其他反革命谣言的制造者，把这些家伙统统挖出来，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

还需要进行艰巨的工作。为了不使反革命漏网，各级党委要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集中一段时间，集中精力，狠抓一下。特别对重点单位、重要案犯、重大线索，要抓住不放，不管追到谁，一追到底，一定要追个水落石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学、批、追、促，最重要的是学和批，要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认认真真地抓紧抓好。要深入批邓，彻底揭穿邓小平的画皮和极右实质。只有学好批深，才能把追查反革命和各项工作很好地开展起来。因此，各级领导要站在斗争的前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把学、批、追、促抓紧抓好。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批，带头揭，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 原载《共识网》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